

January 2014

The Pursuit of Subjectivity in the Minorities Literature: An Examination of Literary Language Use in the Southwest Border Area

Yonggang Zh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Zhang, Yonggang. 2014. "The Pursuit of Subjectivity in the Minorities Literature: An Examination of Literary Language Use in the Southwest Border Area."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4, (1): pp.175-184.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4/iss1/16>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从语言方式看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追求

——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为例

张永刚

摘要: 民族文学的基本价值潜藏于民族文学主体追求之中,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民族文学语言方式是理解民族文学主体追求的基本路径。在这里,必须认真对待汉语与少数民族母语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必须看到少数民族作家在汉语写作中强化民族意识,寻找与汉语世界进行文化交往的方式和意义。民族作家通过汉语写作重建民族文学,获得真正的话语权利,最终形成有意味的少数民族文学语言方式,使民族身份意识和文化认同变成具体文学现实,必然最大限度提升少数民族文学品位,丰富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这个多彩的世界。

关键词: 民族文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 文学主体; 话语方式

作者简介: 张永刚,文学博士,二级教授,曲靖师范学院校长助理、人文学院院长,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电子邮箱: qjsyzygjs@sina.com 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云南民族文化与文学理论研究创新团队”研究系列成果之一。

Title: The Pursuit of Subjectivity in the Minorities Literature: An Examination of Literary Language Use in the Southwest Border Area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value of the national literature is embedded in the pursuit of its subjectivity, and in the post-modern cultural context, national literary language is one essential approach to understand of the subjectivity pursuit in national literatures. In terms of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darin Chinese language and minority languages, the efforts of minority writers should be noted for their using Mandarin Chinese to strengthen their consciousness of nationality and search for the ways and meanings of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the world of Chinese language. By writing in Chinese, minority writers attempt to reconstruct their national literature, to gain discourse power, and eventually to formulate an influential minority literary language. Writing in Chinese helps minority writers to embody their nation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literary texts, which inevitably promotes Chinese minority literature and enriches Chinese contemporary multi-ethnic literature.

Key words: national literature; Southwest border area minorities; literary subjectivity; mode of discourse

Author: Zhang Yonggang, Ph. D., is a professor and the dean of College of Humanities in Qujing Normal University (Qujing 655011,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 in art and literature studies. Email: qjsyzygjs@sina.com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价值潜藏于少数民族文学主体追求之中,如果我们试图深入了解少数民族文学主体行为的基本特征及方式,必须对民族文学的语言状态进行深入解析。这不仅因为文学是语言艺术,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后现代

背景下主体化问题只有在话语实践中才得以形成,也只有话语实践基础上才能解决文化认同等一系列主体追求问题。

这种思想起自米歇尔·福柯。福柯在审视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体观念时发现权力与知识的共生

状态,认为它导致了话语对主体的规训作用。说得更具体些,主体性正是通过话语方式产生的。主体性是话语的产物,而话语又是权力的产物。因此主体研究的关键不是去认识主体所思考的东西,而应转向主体的话语实践分析。这种思想影响了斯图亚特·霍尔。霍尔明确指出,文化认同在话语实践中形成并在话语实践中发展,如果离开话语实践,认同就不存在。所以,认同正是经由语言才得以产生,并由语言来充分展示的。

在后现代思潮中,语言及其话语方式就这样成为一种极为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不仅是思想形成的表征,而且是思想得以形成的根本,语言当然也因此变得更为复杂,“语言,因其固有的物质性,成为政治和理论领域里统率各种互不相干成分的共同标准。因此,历史理解的全部活动都依赖于由语言决定的指涉模式。”同时,“作为从不停息的机构化进程的产物,语言具有强化、诱惑和说服的功能,但是,因为这种力量藏匿于概念和思想内部,所以显得十分隐蔽”(鲍威 122; 133)。的确,在话语的世界里,种种复杂的意义在悄无声息中汇集,形成强大的力量。

在特定的区域和特定的民族中,主体性会体现出更强烈的“在语言和传统中运作的历史性内涵”(金元浦 132)。当它形成文本,不仅会带有普遍的文学话语含义,还会涉及多民族语言运用的复杂意义。在这里,主流社会通行的汉语,以及汉语中更为规范的普通话,与少数民族母语之间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中的潜在力量,将民族作家的创作置入多重选择的艰难之中,并渗透着丰富的意识形态意义。以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为例,我们可以充分看到语言的这种复杂性。因此,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乃至整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行为以及文学价值的深入理解,我认为,只能在语言中进行,最终也只能在语言中才能完成。

一、汉语与少数民族母语

有一个悖论性的现象是我们讨论少数民族写作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汉语与少数民族母语的运用问题。历史上虽然存在大量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它们用不同民族母语创作,具有十分纯粹的民族特色,但现代意义的中国

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则通常使用汉语写作,“汉语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这已经是我们观念中约定俗成的少数民族文学基本样式。

这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文化共同体的存在决定的。在所有的文化认同中,国族认同具有首要意义,因为对于个体来说,国家其实是一种自我生存方式,它以实施行政管理和释放意识形态强力将个体纳入其中,也将各个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整合而为统一的“国族”。麦迪逊说“人不是天使,所以需要国家”(264)。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国族意识发挥着巨大的纽带作用,“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6-7)。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这种民族的“意象”实际上会更为强烈地体现在国族“意象”中,因为没有国家观念的民族观念实际上是没有灵魂的,无根的,因而也是难以存活的。在中国,“中华民族”就是我们56个民族的国族概念。在此前提下,任何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采用国家通用的语言汉语进行文学创作,从而使绝大多数民族(国族)成员能够接受,与此同时,各民族作家也在这个广大空间中获得文化认可,得到更为巨大的价值回报,这仿佛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在后现代背景下,有一种观念认为,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汉语进行创作,这是主流社会文化殖民的结果,少数民族文学应该运用少数民族自己的语言进行创作,应该在内容和形式上彻底少数民族化。这种看似合理的观念实际上并无现实价值,或者说它只看到问题的一半。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所生活的国家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族认同高居于其他认同之上。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是基于世界范围(或者说是跨国别)的不平等文化传播所形成的理论,它旨在表述西方世界对东方文化的歪曲理解和与之相适应的长久的文化改写行为。在文化殖民中,宗主国通过本国语言的推行等手段,“增加殖民地人民对宗主国文化的认同[……]最后实现其文化的新殖民主义”(姜飞 166)。显然,这并不适合用来解释一国之内的文化同一倾向。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体作为一个确定事实所决定的国族文化想象,在某种意义上不仅合乎主体民族汉族的需要,

也合乎其余 55 个少数民族的需要——除非可以否认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换言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不可能离开“中国的”限定,这种限定在语言上体现出来,那就是汉语在总体上会逐渐成为约定俗成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语言,占据文学书写的主要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文学汉语化历来是一个总体趋势(即使在非汉族统治的朝代也不例外),其原因正在于此。可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使用汉语,在这里既有国家意识形态意义,又有中华民族文化构成上的意义,其内在的强大力量是难以更改的。

但是,问题还有更复杂的一面。由于认同是多层次的,“汉语的”少数民族文学在体现多民族国族认同的时候并不能同时解决不同民族自身文化认同问题,因此长久以来,实际上也存在着少数民族作家运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创作的情况,^①这些用民族语言写就的作品,在本民族的较小范围内流传,一般难以形成较大影响。而在一些特殊时期,汉语的普遍运用形成了对少数民族自身文化认同的强烈挤压,致使民族身份焦虑和文化选择困惑不可避免地出现。后现代正是这样一个时期,随着人们的文化多元观念和个人意识日益强烈,文化认同带来的矛盾也就更为突出。其典型表征就是在文学创作中形成民族母语写作的强烈渴望——它不仅体现为观念上的冲动,还带动了实践上的尝试,^②许多少数民族作家不仅将母语写作当作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基本路径,甚至将之视为文化权利的象征,或者文化坚守的体现。语言的意识形态意义被异常放大。正如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所说,“语言不再表征现实,不再是用来强化主体的工具理性的中性工具,语言变成了,或者更确切地说,重构了现实”(169)。因此在表达母语与汉语基本关系的时候,少数民族作家的言辞往往带着明显的激动与急切:

每种语言都代表着一种绝无仅有的
世界观、文化、哲学、思维方式,都是人类
珍贵的无形遗产,一旦消失,最终可能导
致此种文化的消失。母语消亡,是民族
消亡的前兆。因此我想通过诗歌唤起母
语人群对母语的自觉,让沉睡的心灵重
新沐浴和感知母语的的魅力,心灵深处得
到净化和超越;也提醒“他者”对人类各

阶段和各类型的母语给予足够的尊重,从而实现多元文化的灵与灵的对话。对母语的坚守,就是对某一种人类文明样式的尊重、保全和承续。母语写作是一种拯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用彝语写作,不是要获得多大的名利,而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所使然。在我们这一代我还有能力用自己的母语思考和表达我所认知的世界,我干嘛要放弃呢?如果自己不写的话,靠哪个呢?即使我的子孙无法再使用彝语叙事和抒情,那就让我成为彝族母语叙事和母语抒情的终结者吧!(阿库乌雾)

这是坚持母语写作的彝族诗人阿库乌雾的一段话,很典型地体现了民族作家在当代文化自觉时代对自己民族母语的钟情与依恋。语表的背后躁动着少数民族作家身份意识觉醒后的责任感和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

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中,云南哈尼族诗人哥布是热衷于哈尼族母语写作的诗人,在母语写作中极具代表性。“哥布是一位对母族文化有强烈认同感的民族诗人,母语一直是他捍卫民族文化的最强烈的方式”(马绍玺 89)。他用哈尼文写成《母语》、《遗址》等诗集(出版时又有汉文对照),他的写作被誉为“从大地的根上发出的声音”(于坚 1)。不仅哥布如此,对于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母语写作的魅力几乎是无限的。请听贵州当代彝族女诗人禄琴(原名阿单玛玮)的低声吟唱——

我可以在任何环境随意歌唱
却无法走出村口伸向远方的小路
无法走出结满果实红红的树林
无法走出在异乡听到问候时
那种幸福的感觉
——《母语》

这是又一首用“母语”命名的诗作,在作者心里,彝族母语就是那样充满内在的力量,它带着“彝人的血脉,在这片土地上延伸”。诗歌毕竟是一种最敏捷的艺术,它细致地呈现了母语引发的民族作家心灵中最细微的变化。

怀念与亲和自己民族的母语,渴望用民族母语进行言说,这种个人愿望在后现代背景下是如此质朴与强烈,不断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众多作家笔下迸发出来。它使我们感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心灵深处压抑着的关于话语方式的本真冲动已经导致了一种质变——人们对文学上的汉化由忧虑转化为一种文化上的警觉。这与建国初期自觉融入主流话语的追求大相径庭。

“宁肯欧化,也不汉化”正是这种转化的一个证明。这句宣言式的口号出自一位藏族青年作家之口。它使我们突然惊觉“汉语的”少数民族文学在远离少数民族文化的路上已经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导致了如此强烈的逆反心理。确实,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长期跟随主流文学脚步,亦步亦趋,几乎成为主流文学的翻版,久之,所谓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文化特质被抽空,许多作品只能通过作者族别来定义它的族属。可以说,这既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成就,又是它的一种损失。

如何在国族认同和少数民族认同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一方面成为中国多民族文学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又是具有生命力的“民族的”文学,这是后现代背景下我们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基于此,我们不能将“宁肯欧化,也不汉化”这类想法作简单的意识形态解读,而应将之放到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关系中理解它对民族文学建设的技巧性与策略性含义。从此角度,我们发现“欧化”确实有利于激活日渐板结的“汉语的”少数民族文学思维定势,使其恢复或增强对各民族文化与生活的容纳与表现力。诚如张直心所言“‘欧化文体’又称‘翻译语体’。在云南少数民族作家寻找自己的声音的迂回曲折中,它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说云南少数民族作家一度因其对‘民族形式’——也即汉话本、古典白话小说传统的偏至执守而作茧自缚;那么,直接从翻译语体中吸取养分,藉那些新奇的、现代型的语言、形式之促,则助成了他们从凝固的话语秩序的羁束中脱颖而出”(张直心 100-01)。应该说,后现代多元文化格局正在促成一种开放的文学视野,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并不有利于这个多重选择的世界,因此在文学语言形式和写作技巧方面,“宁肯欧化,也不汉化”之说虽然偏颇,却也不无裨益,“假若我们不再戴着‘阶级斗争时代’那副老式花镜去审查这

句话是否藏有什么‘叵测的居心’,而是从民族文学介入国际性交流后理当获取各色各样的选择权这样的文化学角度来积极理解,便不难认定这句虽不无偏颇的短语所包含的一份难得的悟性”(关纪新 朝戈金 71)。

毋庸讳言,倡导母语写作确实带有规避汉化的倾向。表面看这也确实具有回归民族原在生活的功效,但实际上却不能形成更为有效的文学方式。我们知道文学活动是一个由作家到作品再到读者的过程,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创作,阅读、交流、沟通也是这个过程的重要内涵。要实现这种丰富性,在语言选择上,它不取决于作家是否具有母语写作能力,甚至是否用母语写出了作品。而在于这些作品是否可能获得广泛的接受,是否在这种接受中实现了丰富的文学价值。在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文化共同体是赋予文学最大价值的场域,它带着天然的整合之力,这是任何作家,包括少数民族作家都无法拒绝的空间。而这个共同体中流行的共同语言是汉语。说到这里,逻辑似乎又回到了它的原点,汉语的巨大力量再次显现出来。直白地说,要么你满足于母语写作的狭小空间,要么你以种种方式回到汉语,以追寻民族文学更大的影响价值。这是一个悖论式的选择,它考验着少数民族作家的智慧与胆识。

因此,在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关于语言的运用常常形成种种矛盾现象。比如有有的作家用母语写作作品,出版、发表时又将其译为汉语(像哈尼族作家哥布那样);用母语创作的作品,又有待进行汉语翻译,而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原创性流失,产生新的遗憾;有的作家干脆运用双语创作……面对这些复杂情况,主流文学世界的积极作为再次体现出来,国家将母语写作作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加以鼓励,但同时又重视母语文学对汉语的翻译工作;^③据报道,云南计划每年出版十部民族母语文学作品;少数民族地区的传媒(广播、电视)也开辟了民族母语节目等等。种种现象说明,关于民族文学语言的运用,主流文化其实始终掌握着主导性,体现出鲜明的强势色彩。那么,通过汉语写作来认同并弘扬少数民族文化的有效方式到底在哪里?

二、汉语写作中的民族意识

如果少数民族母语写作更多地只是表达了浓

厚的民族感情,满足了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心理需要,并不能形成中国主要的民族文学活动方式。我认为,通过语言来认同并弘扬民族文化的有力方式必须更多从汉语写作入手。少数民族作家在重视母语写作、探索双语写作的同时,应该着重探寻通过汉语写作重建民族文学的途径。

就像福柯、霍尔等人所言,语言既然具有重构现实的能力,认同既然要在话语中才能发生并得以实现,那么在话语权的角逐场所,汉语其实提供了一种巨大的可能。换言之,成功地用汉语表现少数民族的生活与心灵世界,少数民族的话语权利才会被有效证实。少数民族母语写作是汉族知识分子和大众无法进入的世界,在一个没有对手甚至没有倾听者的地方,所谓文化权利的争取,文化认同的努力,甚至这一切发生与否实际上并无太大意义。孤独言说的实际效果几近文化失语。无论从何种角度看,汉语都可以说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无法离开的世界。既如此,以主动姿态使用汉语,甚至改造汉语,使之更适合表达民族生活与民族文化,从而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应该是后现代背景下一一种更富现实意义的选择。

在使用汉语是否会导致深度汉化问题上,我赞同这样的观点:“采用汉语写作,并不意味着必然选择‘汉化’的文体。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在尊重汉语言基本结构法则的前提下,完全可能也应该重新组织和创造有民族意味的形式[……]因为文学语言不仅仅是内容的载体,它本身就意味着内容,意味着某种文化”(张直心95)。实际上,在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白族作家张焰铎、景谊,佤族作家董秀英,哈尼族作家哥布、黄雁、存文学,彝族作家吉霍旺甲等都在灵活使用汉语中增加了对民族生活表现的力量。

后现代是一个既注重多元文化并存,又注重交往与对话的时代。文化(包括语言)一方面具有强烈的趋同倾向,一方面又存在多重选择可能。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对汉语的运用中,如何加强少数民族意识,体现少数民族文化特色,上述想法并非只是空泛的倡导,也有成功的实践提供了佐证。主要体现在:

1. 民族地域方言的运用

西南边疆是中国富有特色的地方,西南边疆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自然环境尤为这样。奇丽的山水、民俗和民族语言带着特殊韵味,它促成了不同特色的方音方言。少数民族作家在运用汉语创作的时候,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方言融入其中,使文本中的汉语明显地增加了少数民族意识和文化意味。方言的这种表达效果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人类的感觉经验无限丰富,但人类的语言则始终有限,言不尽意,意不称物,语言永远无法满足感觉表达的需要,即使汉语也不例外。新的词语提供的往往是一种新的感觉经验,方言的鲜活性正由此产生。与此同时,“人类异常丰富的经验需要经过语言这层纱布的过滤,才能呈现到人类的意识之中。而且词语一旦形成,就会脱离人生并有遮蔽人生真相的可能”(季广茂28)。语言因此具有再造现实之功能。巧妙地运用民族方言,民族意识也就可以在汉语写就的文学世界中再造少数民族的某种现实和心灵。因此我们不可小看方言所包含的民族意识的表现作用。

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中,哈尼族作家诺哈较强的语言运用能力就明显体现在将汉语普通话与本土方言结合使用之上,在小说《蕨蕨路》中诺哈写道:“牯子在盘盘曲曲的村道上,悠哉游哉,向牛圈走去。骑在牛背上的牧童,箆帽倒扣在背上,蓑衣披着,小巴乌别在蓑衣下的系腰带上,小腿一摇一摇,打着一声两声尖厉的唢哨”(132-33)。“牯子”、“箆帽”、“巴乌”、“别”这些词语在汉语词汇中基本上是不见的。这样的文学语言,使人感到鲜活,原因正在于方言带来了民族特色,使少数民族思维的简朴与粗犷得到十分明显的表现,同时也使民族的感觉方式、表达方式以及作者的审美方式形成了特点。

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中,像诺哈这样巧妙运用方言俗语来展现少数民族意识,将汉语与方言俗语融合在一起,不让汉语形成强势的言说力量,从而将本民族独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突出出来,给读者带来陌生化语言感受的作家不在少数。哈尼族作家存文学在《那年的牛头谷》中也体现出这种特点。他写道:“接着,就是铲各家菜园里的肥土,说要是不能铲上面会长什么主义。黑沙想了许久,也没能把主义想透,他想那主义一定是像龙舌兰一样带刺的东西,不然为什么怕它长出来呢?”(6)。“这些人啊,什么民兵也好,队长也罢,大家不都是喝一座山冒出来的泉水长大的

哈尼人吗?什么坏分子好分子,黑人红人,不都是那些做官的作弄人的圈套吗?再说这几年,就是用根铁索子拴棵大树也该松绑了,怎么现在反而把索子愈勒愈紧呢?这是人啊。也可怜那些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转的,上面的叫几句他们也顺嘴哇哇地吼几声,他们也只能是些地上的天狗蚂蚁”(21)。在这样的作品中,正是方言将人物置于了一个特定的语境之中,使我们看到了地处边缘的哈尼族山寨对那个时代流行生活的质朴认识。方言的使用在此巧妙地否定了当时那种革命话语,流露出无意识(或低视点)中的大智慧,也彰显了哈尼族人本真的性格。

贵州彝族作家吴勇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水西悲歌》充满了富有地域风情的民族方言,像“老熟脚”、“黄豆儿”、“箐林”、“大海碗”、“刺芭林”、“曲里拐弯”、“站稳罗哟”等就是这样;再看作者笔下的猴儿关,“靠关的一户彝寨,总有数十户人家,茅屋红壁,炊烟袅袅,云空射下来的一抹夕阳照射在寨旁盛花的梨园里,竟展现出一种胭脂色”在这些语言的方言土味中,黔西北独特的民俗民情让人历历在目,印象鲜明。

在文化意义上,不同的方言其实是不同的世界观的一种体现,它们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社会的,这些彼此不同的方言或话语系统不仅仅包含着对事物的不同命名,也包含着不同的评价体系、价值体系(耿占春 167)。那些在标准普通话中难得一见的词语,使少数民族文学语言产生了陌生、质朴的山野之感。可以说,正是独特的方言在少数民族汉语写作中的出现,使少数民族文化意识最小限度得以保持。

2. 民族神话叙事技巧的展现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有着丰富的神话资源,有意识地使用民族神话叙事,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在汉语写作中的一个话语技巧。就云南而言,“由于迟缓的社会历史进程的代偿以及封闭的地域环境的蓄积,云南边地不仅沉淀着极其深厚的神话意识;而且至今仍遗存着俨若‘活化石’的神话形态”(张直心 142)。自新时期以来,民族作家不仅发现了这些得天独厚的文学资源,而且意识到这些神话、仪式、民间故事等在活化文学语言表达上所具有的价值。可以说,正是神话叙事方式得到技巧化运用,才使后现代背景下少数民族写作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特色不至于彻底流

失。

每个民族的神话都带着这个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神话甚至就是一个民族的早期认知思维和文化表达的集中体现。“按照一般的看法,神话并不是史前时代或原始时代的个人创造,也不是个人某种想象力的产物,而是在一个种族或民族中经过世世代代长期流传和加工而成的”(朱狄 651)。神话因此充满集体无意识和原型意味。“现代作家所使用的个体的神话诗学,既是通过集体意识、集体经验的普遍历程加以个人化的构拟,以进入创造性的个人的神话,也是对现代社会杂乱经验的整饬,赋予暧昧的个人经验及其内部活动的一种神话类比和象征结构”(耿占春 258)。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神话叙事进入其汉语写作中所形成的效果也与此相类。文学内容的丰富性是由语言体现的,在这类优秀作品中,民族神话叙事技巧性地改造了汉语,使其带上神秘色彩与丰富意义。

哈尼族作家诺哈的小说《白鹇梦》、艾扎的《白鹇树》都运用了神话叙事技巧。《白鹇梦》穿插叙述了哈尼族的民族历史,白鹇妈妈是传说中哈尼人的先祖。主人公虹收从小就听阿妈讲了白鹇妈妈的故事,她已经将白鹇妈妈当成了精神的信仰;虹收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儿子阿嘎,以鼓励儿子坚强。但是精神的重重打击,还是摧垮了虹收;虹收在奄奄一息的时候,还在做着追逐白鹇妈妈的梦。她梦见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她飞起来了,她变得年轻了,这个世界风景美丽,她在这个世界轻松愉快,她在这个世界尽情飞舞,她看到了一排白鹇,便追逐而去。作者通过神话完成了超现实的文学表现,同时展示了对哈尼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心理,作品的语言因神话叙事技巧的运用而变得十分亲和畅达。

佤族作家董秀英《摄魂之地》等作品在语言上的新奇也来自于这种关于本民族的神话叙事。可以说正是神话叙述才构成《摄魂之地》的语言特点和语言张力。在《摄魂之地》的“现实生活”中,主人公叶嘎的阿妈和阿爹一直住在岩燕洞,直到死都没有回过部落。他们在死之前,却一定要到出人洞磕头,因为出人洞是布绕克人的祖宗居住的地方。小说还叙述到部落每遭遇一次劫难,长奶女人都出来拯救他们。小说耐人寻味的是在解放军进入布绕克部落,试图启蒙阿瓦人时,阿瓦

人却不相信,“什么解放不解放的,没有听说,慕依吉神没有告诉过我们阿瓦,人间有叫解放的好人”(董秀英 269)。为了阻止砍人头,安木嘎砍下了自己的头。小说没有告诉我们是否制止了砍人头行为,给我们留下巨大的悬念。它暗示阿瓦人并没有被简单启蒙,阿瓦人信仰的依然是慕依吉神。读完作品我知道,野蛮对文明的抗争具有巨大力量,这个力量的来源及源源不断的动力,正在于那个永不消散的神话。可见,这虽然是一部汉语的作品,董秀英还是借助神话叙事向母族文化靠拢,展现了鲜为人知的佤族生活和民族意识。在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写作中,民族神话叙事是相当普遍的。不仅诺哈、董秀英这样做,还有我们尚未提到的韦其麟(壮族)等大批优秀作家,都以这种神话叙事技巧展现了少数民族文学思维的独特性,因之产生的语言效果,对占主流地位的汉语形成了积极的影响。

3. 民族奇异性的展示

过去,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被歧视为“蛮夷”、“南蛮”,主要原因是大汉族主义极端化思维作祟,但也说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确实具有独特性。在后现代背景下,这种特点正在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汉语写作中,展示这种民族奇异性,不单单是对文学内容方面的要求,也是对文学语言上的要求。粗犷直硬的语言对于精英文学和主流文学也许是一种缺陷,但对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来说则是一种质地,它可以契合西南边地民族生活与性格的素朴本真,形成原在的表达张力。将这一粗犷、质朴的语言品格凸显出来的作家,其作品中自然充盈着民族意识。苗族作家李必雨在展现民族奇异生活方面就很有特色,他的代表作《野玫瑰与黑郡主》是具有影响力的作品,这种影响力正是来自于将远离主流社会和政治中心的边地生活的“特异性格”、“异域色彩”表现出来的结果。

三、有意味的民族文学语言

与中国所有少数民族的写作一样,后现代背景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在语言上的思考与探索,并无成规可循,需要创作的勇气与智慧才可以有所收获。正如利奥塔在《后现代处境:一份知识报告》中谈到,后现代的可能就是在现代性中

将再现的不可再现之物展示出来,它拒绝了美的形式之慰藉,拒绝了集体分享不可接近之物的怀旧感,拒绝了可能的趣味一致,它探索新的再现物,却不是为了欣赏它们,而是为了传达一种更强大的不可再现感。一个后现代艺术家,或者一个后现代作家,也处在一种哲学立场上:他所写作的文本,他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在原则上并不受预先建立的规则的制约,它们是不可能根据一种确定的判断以及将熟悉的范畴运用于文本或作品来进行评判的。而那些规则和范畴恰恰是艺术作品正在苦苦寻觅的东西。因此,艺术家和作家为了表达未完成作品之规则,就必须撇开这些规则而创作(81)。事实就是这样,撇开规则而寻找规则,才能在多元多样的文化环境中找到新的路径,使深受汉语影响的少数民族文学语言成为新的有意味的民族文学语言。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把本民族语言中鲜活的词汇、语法以及由此连带着的陌生化的民族思维运用到汉语语言说中,在一些特殊文本中又运用神话叙事技巧表达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内容,形成独特的文学语言方式,这一方面增强了民族文学的表达效果,传达出特有的民族气氛和民族气质,另一方面也使逐渐格式化的汉语增强了新的表现力。可以说在运用汉语形成有意味的民族文学形式的过程中,其努力是积极而富于创意的。

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写作中,有意味的民族文学语言也就是体现了少数民族作家民族身份意识和文化认同感受,带着少数民族感觉与言说习惯,具有一定民族审美情趣的文学语言。它可以由民族母语构成,也可以由汉语构成。从上述分析我们知道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大多采用汉语进行创作,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已经完全汉化。在其作品中本民族的文化精髓往往通过富有特色的语言流露出来。

彝族作家罗庆春和徐其超就汉语对彝族生活的表现问题作过较为细致的探讨,从中我们可以借鉴所谓有意味的民族文学语言的构成方式。罗庆春和徐其超认为成功表现了彝族生活的汉语文学语言有三个逐渐深入的层次。第一层次是题材内容的记叙层,即运用汉语去记叙有关彝族的历史文化、生活境况、情感历程等;这一层是汉语表达方式与彝族文化题材的表层碰撞与表层结合。第二层是文化意义的表现层,就是运用汉语表达

方式努力地通过自己所涉及的题材内容来尽量传达出特殊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第三层次是观念意识的超越同构层。进入这一层次的汉语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汉语,或者说不再是汉文化意义上的汉语,而是一种经过了彝族作家、诗人全面变构后用以表达和承载本民族文化发展体系的新的汉语(杨红昆 欧之德 33)。尽管这只是针对彝族汉语文学的论述,但它适用于理解整个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汉语创作问题。使用汉语又不为汉语所限制,而是打破了汉语的习惯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使之成为表达本民族独特思维和独有文化之载体,最终突破汉语规范,一定程度活化了汉语,有意味的民族文学语言便告成立。

佤族作家董秀英可以说是“汉语民族化”的优秀典范。民族方言土语与语言结合,加之神话叙事技巧的运用,使她所使用的汉语产生了独特的效果。《摄魂之地》是董秀英最优秀的作品,它的开头部分充满了晨光初现的淳朴的生机——

利吉神造出了地,路安神造出了天。
接着造了水牛、黄牛、马、鸡、狗、猪、
马鹿、麂子、熊、老虎、猫……

神在地上造了树,造了人,把人装在
巴格岱山的一个石头洞里。

人在石洞里很闷,就放声大哭起来。
[……]

“岩洞就是你们的家,你们进来。”

阿瓦人不清不白地瞧见一个长奶女人
推开石门。

阿瓦人进了石洞。

大雨下来,雨点滴答滴答,打歪了小草,
打疼了树叶。阿瓦人在石洞里从头
到脚干生生的。

石洞的墙顶上有岩燕的房子,雨来,
它们都回到窝里。

大雨走后,阿瓦人找到了土地神。

“你们人怕雨淋,就学着岩燕一样
盖房子。雨来躲雨,风来挡风,日头毒时
遮光,夜里在里面睡觉。”

阿瓦人回到了三棵黄心兰树下。他们
抓了一竹笋活老鼠,砍下老鼠头,祭在
三棵大树根上。在淋着老鼠血的地方学
着岩燕盖了房子。(董秀英 55-58)

在这样的语言中,作为自然之子的佤族人,他们的出现是何等自然、洒脱,充满了初民的单纯与灵性。我们再看它的粗犷与狂野——

叶嘎的阿公一飞剽过去,没有插进
心脏,而是戳进了屁股肉上。野牛扑向
阿公,阿公来不及躲闪,被野牛挑了一
角,脑袋开了花。木软向野牛冲去,野牛
死命朝他撞来,一角挑破了他的肚子。
肠子吐出了肚皮,木软的肠子拖在了落
叶上,有的挂在小树上,他清理着,一点
一点塞回肚子里。

砍头英雄老木软让他身后的一窝女
人,烧一堆柴火,他拿着砍头刀,很快割
下了一团他的脚腿肉,擦上盐巴,在火上
烤熟后,放到鼻子上闻闻,在刀口上划成
两半,上下掂量了一下,一半他放在嘴
里,另一半要老长奶递给解放大军。
(董秀英 210; 278)

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情景,对典雅的汉语审美惯性形成了挑战。它们跳荡的节奏随着连绵的动词一起急速闪现。在这些陌生化的语言中,你首先感受到的是少数民族文化还是汉文化?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肯定,它们将读者带入了佤族部落原始的生活姿态之中,表现了鲜活的,同时也使我们感到奇异陌生的少数民族原生态生活情景。董秀英作品的话语方式中还有一种纯朴的万物有灵观念,其大自然意趣盎然,民间文学那种天然的诗化意味在其笔下自然流淌,带来了少数民族原始文化的浓厚气息。可以说董秀英笔下的汉语具有了一种陌生化疏离化的佤族式语言味道。对这种汉语佤族化的感受,云南著名作家黄尧评价说“最直接的感受是它象一条打满结子的绳子,疙疙瘩瘩的,不那么顺畅,然而它的整体状态可以传导一种仿佛木鼓似的‘咚咚声’——沉滞但不呆板且弥漫着广远的恢弘,佤族的那种无尽的灵性就在每一个音符的间隔里蹦了出来,活脱脱是人是鬼”(89-90)。这种活化了的汉语其新异的审美冲击力是可想而知的。张直心说“董秀英文本因其无蔽而透露出的语言的粗莽、野性,

强力地刺激着语言洁癖者日趋雅化、纯化、钝化了的感觉”(113)。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语言运用过程中,董秀英的写作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昭示,值得我们长久深思。

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乃至整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汉语与民族母语的基本关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文化认同的丰富意义在语言的使用中不断浮现,既导致文化上的矛盾与冲突,又提供了寻找新的解决方式的巨大空间。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角度来说,文化权利的争取使之十分关注语言问题,然而,无论在文学理论上寻找答案还是在文学现实中探索路径,语言的选择与运用都需要智慧与胆识,非此即彼的绝对化的二元对立思维只会带来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损害。反之,以多元多样和谐并存的宽容胸怀,思考汉语与民族母语的基本关系,获得宽广的文学与文化表达空间,对于汉语和少数民族母语都是有好处的。这也正是后现代背景下文学发展的基本思路。“能否对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做出重大贡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少数民族汉语作家、诗人能否很出色地完成本民族母语文化与汉语表述方式的深层凝合”(杨红昆 欧之德 32)。我们相信,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之中蕴藏着丰富的语言资源,当它找到与汉语的恰当的交往方式,它们便能互补共存,在多向度文化认同中最大限度地丰富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当然,最终也将最大限度地丰富中国当代文学。

注释 [Notes]

①在母语写作中,用维吾尔语、藏语、朝鲜语、彝语、蒙古语等写作的文学作品较多。

②据阿牛木支(彝族)研究,当下用彝族母语写作的作家已蔚为大观,阿库乌雾、阿鲁斯基、木帕古体、阿洛可斯夫基、贾巴甲哈、贾瓦盘加、阿蕾、马海汉呷惹、时长日黑、沙马加甲、石一打达、阿力布且、阿呷依布、曲林、阿来果铁、依乌、尔古阿木、布约伍呷、阿惹里夫、阿说伍萨、吉子拉洛、罗洪呷体、吉克拉尔、阿西伍呷等都是有成就的彝族母语作者。彝族诗人阿库乌雾的母语诗集《冬天的河流》,阿鲁斯基的母语散文《放野鸡》、木帕古体的《灵魂在飘荡》、阿洛可斯夫基与贾巴甲哈共同演绎的母语长篇散文诗《情满凉山》、贾瓦盘加母语长篇小说《火魂》都是有影响的彝族母语作品。参阅阿牛木支“彝族母语文学的文化生态与现代书写”,《文艺报》2008年12月18日。

③2007年5月29日,由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杂志社和国家民委《民族团结》杂志社联合举办的“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在北京开班。开幕式上,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金炳华就指出,我们设立了少数民族翻译基金,将少数民族母语创作的作品翻译成汉语,将汉语的优秀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这样,可以让更多的读者读到用少数民族母语写作的作品。目前这些工程已进行了两年。据统计,目前我国55个少数民族都已拥有了自己的书面文学作家,一些人口较少民族不仅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代书面文学作家,而且开始形成自己的作家群。因此,近年来,少数民族母语创作和翻译工作也得到了加强——蒙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朝鲜语、柯尔克孜语、彝语、傣语、哈尼语、景颇语、傈僳语、锡伯语等民族的母语创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不少用母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得到了及时的翻译和介绍,在文学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保罗·鲍威编《向权力说真话:赛义德和批评家的工作》,王丽 王逢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Bowie, Paul, ed. *Edward Said and the Work of the Critic: Speaking Truth to Power*. Trans. Wang Li & Wang Fengzhe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03.]

存文学《鹰之谷》。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

[Cun, Wenxue. *Eagle Valley*. Kunming: Yunnan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1998.]

董秀英《摄魂之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Dong, Xiuying. *The Land of Mastermind*. Kunming: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2.]

耿占春《叙事美学:探索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学说》。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Geng, Zhanchun. *Narrative Aesthetics: An Exploration of an Encyclopedic Theory*. Zhengzhou: Zhengzhou University Press, 2002.]

关纪新 朝戈金《多重选择的世界》。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

[Guan, Jixin, and Chao Gejin. *The World of Multiple Choices*. Beijing: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ress, 1995.]

黄尧“好人董董”，《文学界》24.1(1997):87-90。

[Huang, Yao. "Dongdong, A Good Man." *Literary World* 24.1 (1997): 87-90.]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处境:一份知识报告》，岛子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

[Lyotard, Jean François.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Dao Zi. Changsha: Hu'n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96.]

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Jiang, Fei. *The Postcolonial Context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5.]

季广茂《意识形态视域中的现代话语转型与文学观念嬗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Ji, Guangmao.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Discourse and the Evolution of Literary Ideas in Ideological Perspective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金元浦《文学解释学》。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Jin, Yuanpu. *Literary Hermeneutics*. Changchu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7.]

马绍玺《在他者的视域中——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Ma, Shaoxi. *In the Horizon of the Other: Minority Poetr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Beijing: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 2007.]

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Madison. *The Federalist Papers*. Trans. Cheng Fengru.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0.]

诺哈《蕨蕨路》。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

[Nuo, Han. *Berdensome Road*. Kunming: Yunnan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1998.]

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转自姜飞:

《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Poster, Mark. *The Second Media Age*. Trans. Fan Jinghua. Quoted from Jiang Fei. *Postcolonial Context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5.]

阿库乌雾《彝族母语文学艺术的春天到来了》,彝学网,西南民族大学。2010年8月26日。2011年3月10日。< http://222.210.17.136/mz_wz/news/2/z_2_42243.html >。

[Wuwu, A Ku. "The Spring of Yi Native Literature and Art." Yi Learning Net.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26 Aug. 2010. 10 Mar. 2011. < http://222.210.17.136/mz_wz/news/2/z_2_42243.html >.]

杨红昆 欧之德主编《彝族哈尼族文学评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Yang, Hongkun, and Ou Zhide, eds. *Literary Critical Essays on Hani and Yi Literature*. Kunming: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Press, 2001.]

于坚《倾听哥布》。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

[Yu, Jian. *Listen to Gerber*. Kunming: Yunnan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1992.]

张直心《边地梦寻——一种边缘文学经验与文化记忆的探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Zhang, Zhixin. *Dreams in the Border Area: An Exploration into a Marginal Literary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Memory*.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6.]

朱狄《原始文化研究:对审美发生问题的思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

[Zhu, Di. *A Study of Primitive Culture: Reflections on the Aesthetic Problem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House, 1988.]

(责任编辑:王嘉军)